

盲敕令与邪恶之眼

予历史以鲜活，注入『为我所用』的元素。让读者通过阅读，看见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书间道



《长城》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莱
重庆出版社
2016年12月

世界上很难找到像伊斯梅尔·卡达莱和萨曼·鲁西迪这样，身世与心路历程均如此相似的作家。前者来自阿尔巴尼亚，流亡法国多年，后者是印度裔英国作家。都用非本民族语言写作，卡达莱居于巴黎开始改用法语写作。两人都是历史系毕业生，作品侧重于历史题材。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布克文学奖获得者。

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布克奖恐怕是既受作者们重视，又受读者青睐的文学奖项。鲁西迪是三届布克奖得主，卡达莱则是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得者。可见，卡达莱获此殊荣，是世界文坛对其写作成就的肯定。

当我们谈起他们的作品时，读者会迅速地自动分为两派：一派无限迷恋两位作家，惊为天人；另一派称其晦涩难懂，“不是我的菜”。以我的阅读体验，两位作家都很值得阅读。阅读鲁西迪，感觉脑洞大开。他会将读者拖入无边的历史想象之中，嬉笑怒骂，读起来趣味良多。而对于卡达莱来说，历史就应当厚重，阅读他的小说通常会被一种使命感包围，变幻的隐喻犹如堕入迷宫，时刻都想问自己一次：为什么？

《长城》是卡达莱最新的短篇集，2013年于法国出版。国内出版，尚属首次。书中收录了《长城》《致盲敕令》和《阿伽门农的女儿》三部中短篇小说，是卡达莱离开阿尔巴尼亚时偷运出的部分手稿编辑而成。

《长城》是个小短篇，讲述的是一个戍边明将宋督察与蒙古蛮夷勇士库特卢克对峙的故事。当然，他们居于长城内外，所谓的对峙也无非是内心独白。卡达莱的母国阿尔巴尼亚是东南欧的一个小国，偏巧位于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桶的西南部。而这里，曾遭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侵略统治长达五百年。长城虽然坚固，且可修补重建。但是朝廷腐败、太监专权已经预示了元军铁骑踏破中原指日可待。这便是卡达莱想告诉我们的历史警示。

三篇小说中，我最喜欢《致盲敕令》。它荒诞、幽默，诉有形于无形。这种风格倒与鲁西迪的写法颇为相似。他们予历史以鲜活，注入“为我所用”的元素。让读者通过阅读，看见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敕令”，即帝王的法命。书中的盲敕令是说在19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对拥有“邪恶之眼”的异教徒强制实行致盲的一项法令。那么，谁有“邪恶之眼”呢？女巫、戴眼镜的人，甚至包括眼球颜色深浅不一的人……种族、宗教、特权以及各类歧视随着盲敕令接踵而来，其中的隐喻不言自明。

然而，在玛丽姑娘家中，“不同成员居然信奉不同的宗教”。盲敕令，不仅为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盲人，也为玛丽姑娘的爱情蒙上了黑暗。难道这不像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吗？统治者对某些导致国家命运的灾难视而不见。所以，卡达莱在书中写道：“他的眼睛瞎了不是因为疾病造成的，也不是由于什么不可抗的力量，那是国家要他这样……”

卡达莱的另一部小说《耻辱龛》，与《致盲敕令》如出一辙。在京城里有一处耻辱龛，专门放置败将和叛臣的首级。可在这种帝国虚假荣耀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悲剧人生呢？这恰是卡达莱对世人的贡献：文学应该具有批评性。

夏丽柠

世间处处都可以成为瓦尔登湖

『车轮上的瓦尔登湖』其实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象征着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

悦读



《车轮上的瓦尔登湖》
[美]肯·伊格纳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所谓“车居族”，就是那些以车为家，到处云游的旅行者——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住家式挂车开始批量生产，车居的观念即在美国风行一时。肯·伊格纳斯即是新世纪美国车居观念的倡导者，他是一位普通的大学生，身上背负着三万多美元的学生贷款，大学毕业后，他一方面跑到阿拉斯加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体验着新奇而极具挑战性的荒野生活。有意思的是，他在杜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居然以一辆二手厢车为家，在校园的停车场内居住了长达两年之久。

《车轮上的瓦尔登湖》是肯的自传作品，也是一部向《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致敬的作品。肯不仅在书中详细写及自己打工还贷、荒野探险的种种经历，写及自己全身放下、乐天开怀、与大自然赤裸面对时的种种感受，同时也特意渲染了一种生活方式、传达了一种人生理念。肯虽然并没有刻意要求自己回到梭罗的时代，但他却与生活在二百多年前的梭罗心意相通，而他的文字也与《瓦尔登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中透露出一种敢于挑战世俗偏见与漠视生活常规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毫无疑问，如果自甘平庸，从在超市兼职开始，肯就会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过上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正经的生活”——这是一种计划好了的生活，其特征就是四平八稳、循规蹈矩，虽然可以保证衣食无忧，却必须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一旦沉溺在这种“正经的生活”中，在庸常与无聊的环境里漫淫既久，一个人就会逐渐丧失自己仅存的野性与活力，从而迷失自我、失去个性，最终变成一个目光呆滞、随波逐流的“可怜人”。

肯坦陈，尽管他并不想一辈子平庸下去，但在走进大学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表现一直平平。一个重新开始的契机，缘于一次自驾旅行，当肯毅然放弃超市升职的机会，驱车数千公里来到阿拉斯加的冻脚镇时，他被大自然的神奇与壮观震撼了，他突然觉得过去的生活竟然那般的灰暗、无趣，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本意。他应该换一个活法，要么疯狂一把，脱胎换骨；要么无聊下去，永不翻身。

摆脱了世俗羁绊的肯从此开始自由无碍地生活。他一边积极地挣钱还贷，一边遵从自己的天性，摈弃物质世界的诱惑，尽量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他把学生贷款看作是通向成人世界的入场券，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包袱，他拒绝父母的资助，开始有意识地磨砺自己，他变身为搭便车的背包客，一路与前重刑犯、嗑药者、猎人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同行，穿越了大半个美国。

做一名18世纪的船夫，划着桦皮舟穿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湖泊和河流，是肯对自己业已成型的生活理念的践行。航行期间，肯在河边的森林里蹲“大号”，用叶子代替卫生纸，洗澡就跳进河里，刷牙就用树上的枝条代替牙刷和牙膏，夜里则借宿在盘根错节的树根之间，与蚊虫为伍，与野生动物相伴。肯发现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寥寥无几，他开始漠视轻浮的现代文明生活，从一个崭新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文明。

“车轮上的瓦尔登湖”其实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象征着一个自由不羁的灵魂——肯以自己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只要你心中拥有瓦尔登湖，世间处处都可以成为瓦尔登湖。

王淼

打捞苏州更为久远的『轻悍』传统

以『枕河人家』来作为小说的题目，即使不说挑战，至少张苏宁在对话，或者在『复调』的意义上展开他对苏州的文学想象

好书我读



《枕河人家》
张苏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4月

和有的城市一样，比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任何后起者写苏州都会遭遇到一个庞大的“文学苏州”的传统。远的不说，就说当代，从陆文夫以降，范小青、苏童、陶文瑜、车前子、叶弥、朱文颖、王啸峰……“文学的苏州”和“真实的苏州”彼此塑造和侵入，变得边界暧昧。当我们谈论苏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些作家文学想象的苏州——或者陆文夫的《美食家》，或者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或者苏童的《城北地带》等。苏州是一座中国的“纸上的城”。

《枕河人家》作为一个晚出者，顽强地以最具有苏州城市地标的“枕河人家”来作为小说的题目，即使不说挑战，至少张苏宁是在对话，或者在“复调”的意义上展开他对苏州的文学想象。还乡的兆瑞向他的异国友人布兰克和高仓原介绍，“苏州水城的特点是水陆并行、河街相临，形成双棋盘的格局。你们看，小巷古宅、粉墙黛瓦，绿水人家绕，所以被称为枕河人家”，这其实是张苏宁对所有的读者介绍他的“枕河人家”的苏州。如果说小说中涉及的风习、园林、中医、文人雅藏等可以是整个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而昆曲传习所、挑花艺社等等这些则是大文化中的苏州地方性文化。《枕河人家》的人物是活在“文化苏州”的。

说《枕河人家》是一部家族小说，大抵不会错。张苏宁写了丁家和潘家因祖上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在中国近现代的命运。外婆讲述的家族往事和“我”讲述的共和国一代人的故事在小说中交错着。两者之间，张苏宁更用心的是家族往事，“我”的故事旁逸斜出固然隐约滋生出家族的文脉，比如建国将祖上收藏的古籍带到插队地，比如“我”对古代器物书画有异于同时代人的品鉴能力。但说到底，这些在家族往事中植入的年轻一代故事可能更多的是张苏宁在长篇小说结构艺术上的雄心。在张苏宁的心目中，他的《枕河人家》不只是一个城市的繁华梦，他的小说地理是从平江路，向西太湖的莲花庵，向苏北里下河不断拓展的。如果对中国城市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其实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讲“从前”的城市应该不是现在讲“从前”讲得最多的上海。就在上海的近郊，苏州、杭州、南京、扬州都比上海有资格讲“从前”。《枕河人家》从晚清退隐官僚讲起，在我们几乎以为他要“怀旧”时，却转而投身到一个现代传奇的讲述，写端方到张宗昌再到日本人对大盂鼎大克鼎的觊觎，写潘家护鼎以至于付出生命代价，各种斗智斗勇，最后有惊无险，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得以善终献给新的共和国，张苏宁最后自己在小说中总结为护鼎有功的兆君是“君子风范加巾帼风采”。

张苏宁的气质使得他不可能像苏童、叶弥、朱文颖、王啸峰那样去写苏州，他的《枕河人家》的亲缘性应该是陆文夫和范小青。陆文夫写苏州有士大夫气、名士气的优游、练达和世故，而范小青则是江南女子的细致温婉、悲悯怜惜。和陆文夫、范小青有所不同的是，《枕河人家》打捞了苏州更为久远的“轻悍”的传统。苏州是出过专诸、要离等侠义之士的苏州，《枕河人家》的丁香（兆君）独立承担起潘家大宅的护鼎重任，回响激荡着吴地的“轻悍”之声。何平